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舞厅·市政

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

马 军著



WUTING·SHIZHENG
SHANGHAIBAINIANYULESHENGHUO
DEYIYE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舞厅·市政

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

马 军著



WUTING·SHIZHENG
SHANGHAIBAINIANYULESHENGHUO
DEYIYE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马军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7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ISBN 978-7-5326-3068-4

I. ①舞... II. ①马... III. ①舞厅—文化史—研究—上海市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2135 号

责任编辑 李 纳
特约编辑 关春巧
封面设计 姜 明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8 插页 2 字数 338 000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3068-4/K·699

定价:5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2431119

教育部第五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4 年重大项目（批准号：04JJDZH007）研究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资助项目
2008 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项目资助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任

熊月之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军 马学强 宋钻友 张 剑

张晓敏 陈祖恩 金大陆 周 武

承 载 钱 杭 唐克敏 彭卫国

熊月之 潘 涛

总 序

熊月之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祆教、锡克教、理教。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不难想象,近百年间的上海,这里是佛教的水陆法会、春节烧香、除夕撞钟、元宵彩灯、观音诞辰、龙华庙会、浴佛盛典、盂兰盆会;那里是道教的画符念咒、掐诀步罡、祈晴祷雨、驱鬼逐妖、占卜堪舆、超度亡灵,各路神仙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到铁拐李、吕洞宾、关公、钟馗、春申君、黄道婆、施相公、秦裕伯、陈化成，一路走来。一会儿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开斋节、宰牲节；一会儿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感恩节、圣餐礼拜、结婚礼拜、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一会儿又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普林节、修殿节、除酵节。这边是留蓄长发、上衣至膝、戴锡佩剑的“红头阿三”锡克教徒；那边是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白衣秀士”袄教信徒；再那边则是壁挂葫芦椰瓢、戒烟戒酒、大摆素斋的理教信众。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

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

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l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那么多的多元的存在,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

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蕴如此丰富、情况如此复杂的城市,正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极好对象。

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厅、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买办、医生、报人、律师、科学技术工作者、舞女生活的研究;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英美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的研究。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上海城市生活,从时间上看,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年开埠以前,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普通沿海城市,与宁波等一般沿海城市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949年5月,即通常称为近代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年5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第四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

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则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来自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欧亚研究所,也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与上海档案馆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多次举行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值此项目完成之际,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谨向各位课题组成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年12月24日

注 释

-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第 70 页。

序

张 宁

回忆起来，与马军初识应在 2002 年春，当时我才进入“中央研究院”不久，正展开一个以近代上海休闲文化为中心的课题。那年 5 月我与同事林美莉联袂赴沪，为各自的研究收集材料，两人整日往来于图书馆与档案馆之间。一日，时在复旦大学任博士后的冯筱才兄说，有一位年轻同道，值得一识，我们遂在复旦旁的一个咖啡馆里，与风尘仆仆赶来的马军晤面。席间，大家互相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告诉他我打算研究上海的跑马、跑狗、回力球等洋娱乐，他则告诉我他正撰写有关舞潮案的论文。第一次见面虽气氛融洽，但我感觉马军客气中略带冷淡，似乎不易亲近。没想到他是个“后热”的人，接下来数年我每次赴沪，必与之见面，由于所做课题相近，在图书数据各方面，他总不吝协助。近几年，我们更进入切磋琢磨的阶段。我每有新作，必请他指正；他每有作品，多传来让我先睹为快。只是他已进入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撰写专书速度之快，令我望尘莫及。

马军研究的课题颇为广泛，小自清末第一代科学家徐建寅，大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在沪的粮食政策，无不细心剖析。他也不划地自限，除学术论文外，更跨足翻译、口述历史等工作。譬如，他排除万

难,将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与英文自传先后译成中文,使中文世界对这位上海的老市长更添认识;为深化其舞厅研究的内容,他更锲而不舍地找到当年的舞女、舞迷、乐师,以及从业人员,一一进行口述访问。马军的著作虽看似四面八方,但脉络其实有迹可寻,基本上一直围绕着上海,这个自近代以来西方事物大量进入中国的窗口。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关心的不只是那些辉煌灿烂的光影,更是上海社会在外力进入后的底层生活。所以他写1948年的舞潮案,看舞女在物价日昂、生计断绝时,如何自发性地联合起来,对不当的政策进行反击;所以他写1945年至1949年的米潮,看解放前夕,国民政府的粮食政策如何导致上海的易手。除上海这个地点外,马军著作的另一特色是时间点,他专治抗日战争结束后至国共鼎革这个时段。一来这是个混乱的时代,同辈学者较少留意,可着力之处多;二来可能也因为这是民国史研究中最贴近当下的年代,较符合马军对上海社会生活的关怀。他先后选择的几个案例,如粮政与舞潮案,都是这时期的重大事件。不过,完成了这些课题后,马军开始对单一时段感到不满足,也不希望再局限于个案研究,他决心将年限向上、向下推展,为舞厅乃至交际舞在中国演进的过程,做一个完整的传记,其成果就是这本《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

在此书中,马军跳脱了向来固守的解放前夕,向上追溯至交际舞初传入时的清末;他也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舞风渐息为断限,向下一直讨论到改革开放后交谊舞的复现。除摆脱时段的限制,他更跨出上海,利用各种二手材料,追溯出交际舞在西方的源起与演进,同时关注舞业在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如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地,以为参照。作者对此书所下功夫之大,令人好奇,为何要投入这么多力气为交际舞与舞厅在近代中国的情形作传?舞厅涉及政府管理、消费文化、文学意象、道德辩论等各式面相,既是“夜上海”璀璨

的代表,亦是妇女沦落的深渊,千头万绪,又要如何入手,才能不失偏颇?对于这些问题,马军表示,这是因为他认为舞厅最能反映近代上海的复杂性。他说,在老上海很难找到其他行业具有如此鲜明的特色。舞厅与交际舞既体现了“中与西”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包含了“雅与俗”的双重可能,舞厅的富丽堂皇与舞女的强颜欢笑同时还是整个社会“奢与贫”并存的具体反映。因此,舞厅不仅是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也是近代上海的一个缩影。它像一面镜子,既照出老上海璀璨的过往,也照出近代中国在两极间的冲撞。正因如此,以往学者论及上海舞女与舞厅时,由于切入点不一,往往如盲人摸象,各执一词。马军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觉得与其漫谈风花雪月,不着边际,不如扎扎实实地先从与舞厅运作关系最密切的市政管理着手,详细厘清舞厅与市政当局的历史关系和彼此互动,再求全貌。

“市政管理”这目标看似简单,但放在近代政权不断转移的上海,就不是复杂一词所能道尽。所以,马军依时序将全书分为七章,分别为:西方交际舞的早期传入(1927年以前)(第一章);“两界三方”时期(1927—1943)(第二章);日伪统治时期(1943—1945)(第三章);国民党重返时期(1945—1949)(第四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1949—1954)(第六章)以及改革开放时期(1979—2009)(第七章)。此外,他更另辟一章,专门讨论1948年的舞潮案(第五章)。我认为,本书对学界贡献最大者,首推第一、二章。第一章一开始,便详细介绍了交际舞的种类、它们在西方发展的历程、欧美快速的城市化与舞厅崛起间的关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爵士乐文化在其间扮演的角色等。一方面让读者在进入正题前,对交际舞的背景有足够了解,另一方面让大家明了交际舞在西方也曾历经争议,是经过数世纪的磨合,才成为普遍接受的社交活动。是以,马军主张交际舞进入中国后所引发的诸多纠纷,不仅是文化差异,更是时代的差异,也就是说,

“中国在重复西方国家近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重复着他们曾经有过的对交际舞及舞厅从最初排斥到最后接受的心理和制度过程”。这是一个有趣且大胆的推论，令人不禁掩卷长思，是否近代中国也是以一种压缩的方式，重复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变化？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对一本书而言，立论则决定了全书的方向。方向既定，本书就从这个不同凡响的推论继而展开“两界三方”的乐章。

近代上海的复杂性在于华洋杂处，有近百年的时间，同时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市政机构。公共租界主要由英人治理，法租界由法人执政，华界则先由清廷、后由民国政府执掌。“两界三方”背景迥异，各自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治理上海，产生的冲突可想而知。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上海市政由于涉及文化、语言等因素，要能同时掌握各方的思考方式乃至思想症结，殊为不易。但马军不为所惧，他一方面全面阅读中文的报章杂志与档案，一方面大量使用上海市档案馆已开放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材料，即便法租界的资料多为法文，阅读困难，但因法租界当局经常必须与公共租界就政策相互协商，一些文件往往双语并陈，遂留给研究者观察空间。正因马军可同时掌握“两界三方”的施政理念，所以方能在第二章中，就舞厅的管理规则、打烊时间、限制入场，乃至消防、噪音、卫生等问题的处理方法，做出详细比较，让读者得以一窥舞场运作的真实景况。

对学界贡献最大的固然在第一、二章，但最精彩处还在第五章的舞潮案。抗战结束后，百废待举，物价飞涨，国民政府从道德理念出发，要求节约、强制禁舞，终于导致舞潮，看原先小鸟依人的舞女如何一变而为泼妇，拳头棍棒齐飞地捣毁上海市社会局，令人击节称快。国民政府的雷厉风行并没有结束舞厅的营业，反倒是国共易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渐进政策，让舞女、舞厅、舞客一步步地从社会上消

失。马军对此有很精彩的比较,他说:如果以拆屋相比,国民党专打主梁,结果总是遇到阻力,后来反而被坍下来的房屋压伤。共产党的方法则迥然不同,他是今天一片瓦、明天一扇窗,循序渐进,等到都拆得差不多了,这房子也毁了。这个观察,证诸今日两党的思维与做法,往往还有令人会心之处。

此书另一前人不曾论及的地方,在于对改革开放后的描述。大部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多将下限置于1949年。这一年国共易手,政治上的鼎革带来社会、经济、生活上一连串绝对性的改变,是个很适合的分界点。近年来,学界始将触角延伸至20世纪50年代,但目的多在观察这些转变发生的步骤与过程,以为前一时代的完结。至于后一时代的开启,由于材料等原因,则多留予专治中共史的学者探究。马军是位近代史学者,但他并不以20世纪50年代的舞风渐息为满足,也不认为交际舞或舞厅的传记应在此告终。他继续往下追溯,二十多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现,交际舞又在上海现身,只是此时已更名为“交谊舞”,主办的单位也从原先的舞厅,转变为文化宫、俱乐部、影剧院、公园及学校。此热潮约和学英文、出国潮等同步发生,二十多年来备受歧视的老先生、老太太现在被请出来到各单位教英文、教跳舞,大家从ABCD、华尔兹一步步学起。虽然社会上对交际舞的争议一直存在,几个复业的舞厅也游走法律边缘,雇用所谓的“女舞师”伴舞,但跳舞已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文娱活动。在经历一百年漫长的演变后,交际舞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

读到此,我恍然似有所悟。马军指正我论文时,经常说我下笔缺乏热情,这评语每每令我困惑不已。历史学的训练本就要求研究者尽量客观、不做妄言。况且我看马军的作品,不是冷静的事实陈述,就是大段的法令条文,也不见得有多热情。现在一页页地拜读完这本《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我才略微体会他的